

# 比较

NO.5, 2013

68

COMPARATIVE STUDIES

吴敬琏 主编

**王小鲁**

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最新调查

**雅诺什·科尔奈**

个人自由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阿萨尔·林德贝克**

政府与市场

**许成钢**

中国模式和金融危机

**阿代尔·特纳**

如何走出危机？

**A.施莱弗 S.詹科夫 R.拉波塔 F.洛佩兹-德-西拉内斯**

准入监管

**陶然**

土地制度改革是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

**焦津洪**

以体制机制创新推进金融改革

**刘克崮 王瑛 李敏波**

建设投融资并重的资本市场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 个人自由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

雅诺什·科尔奈

## 1. 引言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著述，数量庞大且仍在不断增加。中国和前苏联两大经济巨人先后追随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两个先驱小国的足迹走上了改革之路，全世界的兴趣也随着急剧上升。大多数对改革进程的分析采用的是狭隘的经济或技术观点，仅仅关注诸如效率、增长、物质福利和世界市场调整等问题。

本文讨论的是完全不同的内容，即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围绕个人自由提出一些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个人自由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论文选择的主题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我不是要提出某个规范理论；实际

---

\* 感谢为本论文不吝提供宝贵意见的人们，尤其是 T. Bauer、J. S. Berliner、Z. Daniel、M. Ellman、R. I. Gábor、D. Hausman、Z. Kapitány、M. Laki、R. Nozick、A. Sen、A. Simonovits 和 J. W. Weibull。特别感谢 M. Kovacs 专门的研究援助，以及 B. McLean 和 S. Mehta 为本文所做的英文修正。感谢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哈佛大学的支持。当然，作者对本文所表达的观点负全部责任。

上，本文主要想提供描述性的实证（positive）观察结果。不过，请让我在一开始就阐明我的信条。我极其尊重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坚持认为人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我的价值观念体系中，个人自由是重要的基本权益之一。<sup>①</sup> 我认为经济自由的大幅扩展是匈牙利改革的一项主要成果。同样，我认为匈牙利改革最严重的缺陷之一，就是未能充分扩展经济自由。本文的一个目的是建立新的标准来衡量改革运动的进展，并与通常的效率衡量方法结合起来使用。本文将运用这项标准，详细报告匈牙利改革的成功与失败。

匈牙利是我相当熟悉的国家，所以我很自然地选择它为研究对象。但我相信，文中讨论的议题、问题、概念以及关联性，均适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因此，以匈牙利作为范例的同时，本文对各种意见和主张的讨论必将具备更普遍的有效性。

“哥本哈根大会”的与会者以及《欧洲经济评论》的读者中，很大一部分是西方经济学家。这些听众和读者不能奢望本文对个人自由的一般性讨论有很多新奇想法。不过论文的亮点，可能在于探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由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论如何，我都希望社会主义国家能关注本文阐释的观点。几十年来，探讨个人自由一直是思想上的禁忌；诸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概念带着浓烈的贬义色彩。但我深信，尊重个人自由不仅与许多社会主义思想家的最初目标相符，而且还应该成为所有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基本要素。

自由是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反复提及的一个理念，自由问题非但不是完全冷门的主题，而是经常引发激烈的争论。我不打算研究现代分析哲学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将抱持温和、务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尽量贴近当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实生活。

---

<sup>①</sup> 罗尔斯将自由所附带的价值追溯到人们对自我尊重的高度评价，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基本利益……包括一个人的自身价值观，对认为值得实现的个人品行、生活计划的牢固信念……自我尊重意味着对个人能力的自信，相信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没有自我尊重意识似乎就没有值得做的事……我们将变得冷漠而玩世不恭。”参见 J. Rawls (1971, 第 440 页)。

## 2. 概念澄清

即使普通的词典,在“解放”(liberty)、“自由”(freedom)条目下也会列出好几个含义;因此,难怪各类哲学流派对这些词有不同的诠释。我们并不希求为它们提供详细易懂、包罗万象的特征描述。在本文中我们只需要做部分解释,包含那些与我们所研究的复合型“自由”有关的元素。<sup>①</sup>我们希望没有人会对此抱持异议,即本文要探讨的特征属性的确是构成自由的要件。

本文关心的只是个人自由。尽管社区的自由(以及我们想到的企业、协会、乡镇乃至国家的自由)可能非常重要,但我并不打算在此讨论它们。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自由上,换句话说,我们侧重的是支配财富、收入、时间和努力的个人自由权利。本文不研究政治或文化学术自由,相关讨论将仅限于经济自由层面,即使我们非常清楚政治、文化和经济之间的自由有着密切联系。<sup>②</sup>

自由具有工具性价值,这有助于个体在各种替代行为中作出选择。此外,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的个人经济自由能产生某种重要的内在价值。

这个观点务必得到清楚阐述,尤其是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时候。就算家长式专制政府分配给我的物品和我原本可以从备选物品中自由挑选的相同,其中的意义对我来说,也已经发生改变。它赋予我某些额外的价值,让我能够自由且不受干扰地作出选择。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家长式干预措施的结果总是导致个体的自主选择大大偏离基准点。<sup>③</sup>关于家长式统治,我赞同以赛亚·柏林(I. Berlin, 1969)的看法:“因为如果人的本质是独立自主的生命,即他

---

① 关于这些概念的更详细讨论(特别是关于自由概念的生搬硬套而非自由的内在价值,以及积极和消极的自由的讨论),参见 A. Sen (1987) 的马歇尔讲座。

② 越来越多的匈牙利作者意识到这些关系;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最近写的论文中均提倡激进改革。匈牙利学者特别关注已故 I. Bibo 论文集(1986)的出版,其中重新出版了他 1935 年的文章《压迫、法律、自由》。在更近期的文献里,还有 Antal 等人(1987)、Bihari (1986)、Bruszt (1987)、Fritz (1987)、Gombir (1984)、Hankiss (1987) 等人做出的卓越研究。对政治道德哲学有杰出贡献的人是 J. Kiss (1986), 他专门分析了人权的理论基础。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文献几乎尚未有英文版本。

③ Feher、Helter 和 M. Hrkus (1983) 有一句贴切的话:这是“超出需要的专政”。

们是价值观的创造者，追求其自身的目的，而且他们的权力恰好体现为他们的自由意志，那么最糟糕的莫过于认为他们不是独立自主的客体，而是自然客体……统治者操纵着他们的选择……康德说，‘没有人可以强迫我按照他的方式变得快乐。’家长制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家长制之所以专制，不是因为它比赤裸裸的、残酷而无知的暴政更加暴虐……而是因为它侮辱了我作为一个人的思想意识。”

既然我们给个人经济自由赋予了内在价值，就不会认为它只是实现福利或效用的一种手段。我知道严格奉行一元论方法的人可以从方法论上提出异议。但是，我更喜欢使用多元化的架构，来分别处理类似道德终极标准这样的不可通约性，因为这个框架阐明了潜在的冲突和权衡取舍。<sup>①</sup>“哈姆雷特”其实可以是一则很短的故事，只要主角直截了当地构想出并解决掉一个简单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他就能消除犹豫不决的心理。本文稍后将讨论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尽管方法各有差别，其中的思想肯定还是能够调换成一元论体系。但是，任何人想这样做的话，就必须确定并充分捍卫其单一的、最终的基本利益。这个利益可能是最广义的自由，此时，福利必定只是自由的构成要素之一。这个利益也可能是一种效用，此时，自由本身应该是这个效用函数的一个幅角（argument）。<sup>②</sup>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完整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个人经济自由的方方面面。相反，我们只挑出限制自由选择的两类重要约束因素，同时忽略其他众多的制约，无论它们存在何种相关性。

第一类要详细讨论的是官僚约束（bureaucratic constraints）。这类约束包括正式的立法命令或禁令，以及官僚机构施加压力或胁迫个体执行的非正式规则。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官僚约束的性质，恰当的做法就是探究这些约束发生某

---

<sup>①</sup> 关于反驳一元论方法的更详细理论论据，参见阿玛蒂亚·森（A. Sen, 1985），尤其是讨论多元化和不完整性、多元性福利和能动性的章节。森解释说，在某些情况下，只有一部分的备选项排序才能与终极道德标准建立联系。“明确不完整”的排序是有可能存在的。“根据这种观点，不存在额外的道德标准可用于对无序的道德上的善进行排序……明智的道德选择（明确的或默认的）要求我们不要采用那种在道德上看起来劣于另一个可行方案的选项。但是这并不要求所选择的备选项必须是那一套可行方案中‘最好的’，因为鉴于我们的道德排序的‘不完整性’，可能根本就没有最好的替代选择。”参见森（1985，第180—181页）。

<sup>②</sup> 关于过分简单化的“福利主义”的进一步批判以及经济学中道德理论的相关讨论，参见 S. C. Kolm（1987）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本卷是缩减版）。

种变化时产生的效应。官僚约束可能会如何变化，从而增加自由呢？这里我提供了一些例证；当然，这里列举的情况并非详尽无遗。

- 作出某类决定的权力从官僚机构转向个人时，自由增加；例如，学生在毕业后自行选择第一份工作，而不是接受强制性的工作分配。

- 个人决定权受到的官僚约束被解除时，自由增加；例如，假设雇员有权准备辞职并寻找另外的工作，但在真正离开前需征得上司同意；当他不必再寻求这种许可时，自由权就增大了。

- 当现有的官僚约束在量的方面变得不那么严格时，自由增加；例如，根据行政命令，一间私人公司可容纳的最大员工数量从3人增加到9人。

不受制于另一个人、一群人或国家的自由，通常被称为“消极自由”（简单地说，就是“免于”，英文为 freedom from）<sup>①</sup>。根据这种解释，官僚约束的松动或解除无疑增强了消极自由。

贬低消极自由的重要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奇怪传统。这一传统指出正规“资产阶级”权利的空洞虚无，譬如所谓的富人和穷人都有在桥底下睡觉的权利。按照这种观点，只有“积极自由”才是重要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拥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权利（简单地说，就是“为所欲为”，英文为 freedom to）。然而积极自由再怎么重大，消极自由的问题也不是挥挥手就可以不用考虑了，毕竟它在个人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顺便提一句，自由地决定在哪里过夜的权利尚未得到普遍认可，所以我们不能认为那是不言而喻的权利。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未经国家书面许可是不能旅行的，当他们决定要在远离永久居住地的地方多待一两个晚上时，得立即向警方汇报。在随后讨论匈牙利的局势时，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并探讨消极自由的其他方面。

我们关注的另一类约束包含因匮乏而引起的选择限制。可以这么说，我们要处理的是涉及“积极自由”的问题。积极自由通常指的是个人的能力：当他用来实现目标的方法增加时，他的自由也有所增加。这个一般性概念使我们获得了某些更具体的想法。现在让我们给这些“自由联想”做一个假设性实验。谈到积极自由，西方经济学家脑海里最先闪现的可能会是收入、财富、物

---

<sup>①</sup> 关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区别，参见 I. Berlin (1969)、G. G. MacCallum (1967)、F. Oppenheim (1961，尤其是第 109—135 页) 和 S. Gordon (1980，第 133—134 页)。

质和人力资本等概念。这些无疑都是构成个人能力的要素，这些要素的可用性制约着个人的选择自由。如果用展示各类商品的橱窗作比喻，那么对一个没有收入或财富购买那些可得资源的人来说，这扇橱窗是毫无用处的。

倘若在东欧进行类似的实验，东欧经济学家的反应会略有不同。当然，他们会想到贫困、低水平发展，会想到各种资源，比如与个人状况相符的收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头脑里还会迅速掠过另外几个概念。尽管需求非常明确且有一定的货币收入支持，个人可能还是无法以现行价格获得他想要的物品，甚至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能得偿所愿。这种阻挠个人实现目标的障碍，不亚于预算限制。

第一种限制积极自由的约束具有一般性；在所有体制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包括社会主义体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分布的参数因国家而异）。第二种约束较大程度上依体制而定，这也是本文特别关注的主题。我们谈论的不是零星、偶然的超额需求，而是一个因体制因素造成长期短缺的经济体。<sup>①</sup> 所有体制都会发生短缺现象，但在“短缺型经济体”内，短缺尤为严重，这类国家的所有部门都会出现匮乏症状，集中而且强烈，还很折磨人。

我新造了“强制替代”（forced substitution）一词，用来描述短缺型经济体常见的一种典型情况，以便与自愿替代形成对比。后者提供一种选择自由：个人用物品 B 替代 A，因为他的口味或物品的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在强制替代的情况里，按照当时的价格，个体原本更喜欢物品 A，但因为 A 是稀缺物品，所以他没得选择，只能代之以 B。某些时候强制替代仅仅引起小小的不便。在另一些时候，它会造成严重而持久的痛苦，例如人们被迫几十年甚至一辈子违背自己的意愿共用一所公寓；或者多年里无法安装电话，哪怕是生病了、难以行动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迫切需要一部电话。遭遇短缺之苦的人们蒙受的是屈辱，他们只能任由卖家和官僚摆布。<sup>②</sup>

可以想象，即便个体面对的是不会立即选择的可用商品，他也不会无动于

---

<sup>①</sup> 关于短缺综合征的原因和后果的更详细研究，参见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1980）。

<sup>②</sup> 阿萨尔·林德贝克在熊彼特讲座（1988）里讨论了当消费者因为配给或政府法令无法获得更好的消费品时产生的满意度损失。“配给”一词含有一种传统的狭隘意义，包括使用优惠券或其他形式的官方分配。在最近的非均衡研究中，供给或需求中较短一方所使用的任何分配过程都被称为配给，包括排队甚至一个完全随机的选择。短缺对自由选择施加的约束出现在所有类型的配给中。

衷。供应的商品种类越多，替代的物品也就越多；因此，需求的可用物品越容易获得，买方认为可以真正自由选择信念就越强烈。这里根据的是自由的内在价值，因为 C 和 D 同时存在时，个体选择了 C，这不同于选择 C 是因为它是唯一的选项。在后一种情况里，个体被剥夺了自由选择的基本权利；这时出现了某种价值的损失——尽管不是“福利”或“效用”上的损失，因为不管怎么说 C 都优胜于 D。

因此，我们或许会得出结论，随着短缺的强度和频率下降，个人的经济自由将有所提高，消费者的选择机会也会增加。如果这种好转趋势不只是临时性的，并且由于经济机制的改革变成了永久状态，那么这种关联性将更直接、更强劲。

这两组自由约束条件，即官僚约束和长期短缺造成的选择缩减，是密切相关的，这是我们讨论的核心。官方控制是解释为什么出现短缺的因素之一，而短缺诱发了官方配给。然而这两组条件只有部分重叠，所以将它们分开考虑有助于我们的分析。

这样一来，在我们的概念框架里，我们把自由视为一个多维范畴。至此提及的所有个人经济自由的限制是可以观察到的。它们可以用二进制指示器表示（反映某一约束存在与否），也可以用某种刻度来描绘，例如从 0 到 1 的数值（反映上述约束的严格性）。<sup>①</sup> 每项指标代表自由的一个特定维度，以这种方法处理时，自由不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形而上的实体。匈牙利人的经济行为是否自由？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回答“是”或“不”。但对于和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每类约束，人们可以给出有意义的答案，并思考自由的程度或每个特定维度中缺少的自由。

### 3. 衡量标准：最小和最大状态

要评估个人自由程度的变化，需要有衡量标准。若想研究私人市场经济下自由受到的限制，可能应从洛克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入手，即个体生活在一个完全无政府状态的国家。<sup>②</sup> 在图 1 中，纵轴表示国家对经济领域 1、2、3……的控制程度。

刻度“0”，或称完全的无政府状态，是不可持续的。从 0 向上移动到达

---

<sup>①</sup> 人们可以计算出人类智力或经济起落的某个综合指数，按照同样的方法，根据自由的若干可观察的局部指标，制定个人经济自由的综合指数或许并非绝不可能。

<sup>②</sup> 参见 J. Locke (1690, 1967)。



的各个点（图中以“△”表示）代表的是政治哲学家所说的“最小限度”或“守夜人”国家。国家的作用仅限于保护公民免于暴力和盗窃，并强制履行自愿缔结的契约。<sup>①</sup>（此处为简便起见，我们忽视国家在对外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任何额外的国家活动，包括专门用于测算再分配公正度和公共物品供给的举措，都超出最小状态。

至于纵轴的最上端，刻度“1”表示国家完全控制所有的经济领域，毫无私人主动性或选择可言。<sup>②</sup>这种“严格控制的”奥威尔状态纯粹是一种假设，没有任何历史先例，其实也从来没有出现过。让我们通过对比最小状态的概念，引入一个新概念，即最大状态（图中以符号▽表示）。<sup>③</sup>这一点上的“国家社会主义化”（etatization）<sup>④</sup>程度，低于刻度尺的终点，即国家完全控制的刻度点。最大状态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概念；这是官僚权力的最高可行程度，其可行性取决于实行集中化的实际情况。这些情况包括信息的采集和处理技术，不同官僚阶层之间官员们的沟通技能，官僚机构的组织能力，操纵大众的技巧，容忍压制的极限，等等。所以，最大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在个人自由方面作出些许让步，一个典型的让步就是允许个人在消费品市场进行有限度的选择。这种安排可以容忍，但只是暂时的，而且附带的条件始终是：倘若情况适宜，国家将会朝着完全控制的方向采取进一步措施。

综观真实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在其演变过程的某段时间内，已经接近于最大状态——斯大林统治下农业集体化后的前苏联，公社化后的中国，以及1949—1953年期间的东欧。至于各个国家在“国家社会主义化”巅峰时期接近最大状态的程度，不同的经济领域之间存在很大差

---

① R. Nozick (1974) 引入一个完全没有再分配功能的“超弱国家”概念，以有别于隐含一定程度的强迫再分配的最小限度国家的经典定义，根据定义，甚至不想受到保护的一个人，也得接受保护并为此付费。

② 19世纪埃姆雷·马达奇（Imre Madach）的匈牙利戏剧《人类的悲剧》，预言式地描写了反对“法伦斯泰尔”社会这类乌托邦的图景（“法伦斯泰尔”这个名字取自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著作）。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强制分配某件活儿，而且必须在集体企业工作。柏拉图是牧羊人，路德是司炉工，米开朗基罗则是雕刻椅子腿的橱柜制作者。参见 Madach (1861年, 1953年, 第127—145页)。

③ 此处以及本文的其余部分，我们不会单独讨论政党的作用。党的运作与政府机构密不可分，党是这个共同活动的主导力量。在整篇文章中，“国家”、“政府”和“官僚（机构）”之类的概念都包含党的机构在内。

④ “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分析，详见 B. Horvat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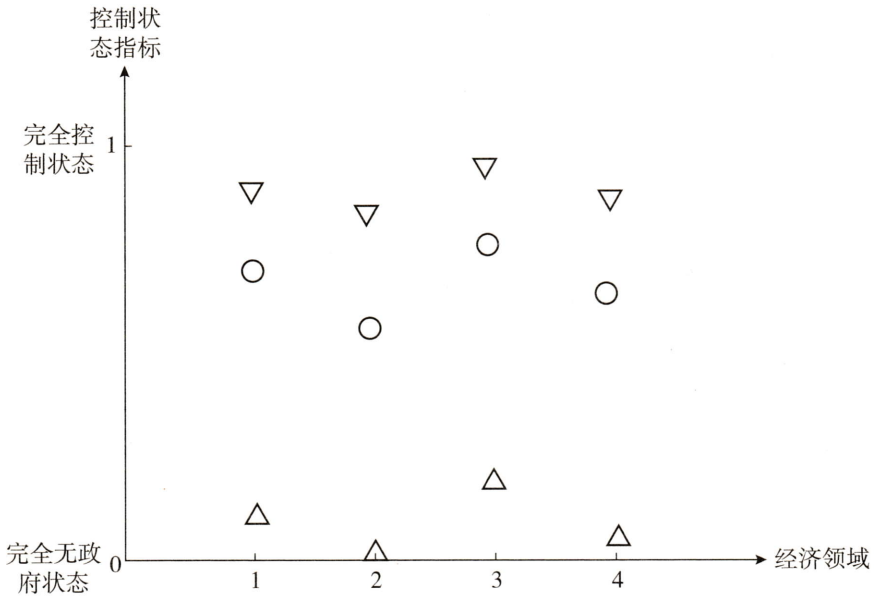


图1 衡量标准图解：从完全无政府状态到完全控制状态

图标符号：▽最大状态，○现实状态，△最小状态

注：本图只是简单概括了本文阐释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思路无需假设不同经济领域之间存在基数可比性。

异。此处我们不可能一一细述；不过，进行一定程度的简化后，通过综合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最大状态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进程的历史出发点。改革的结果，是现实状态的中央控制程度（图中以符号“○”表示）低于最大状态时的程度。

完全可以理解，学者和政治家讨论福利国家的问题时，思考的角度是：它们离最小状态多近或多远，以及它们应该有多接近。同样不难理解的是，当大家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问题时，思考的角度却截然相反：这些国家离最大状态多近或多远以及它们应该离多近。

#### 4. 匈牙利的变革

现在我们来概述匈牙利的变革。关注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会耗费太多时间。因此，我们只需对比两个特定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官僚

集权在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领域达到最高峰，最接近于概念中的最大状态；另一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到目前的时期，我们称之为“改革后状态”。

每项观察都将以简洁易懂的形式呈现，而且我们不准备借助统计学来进行定性分析。<sup>①</sup> 此外，为求准确，每一项都可以加进很多条件，但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专注于所有细节。<sup>②</sup>

匈牙利的一部分改革是明确修正法律，并最终废除旧例、出台新法。另一部分不那么重要的改革不是公布了新的规则，而是放宽了旧法律和政府指令的执行尺度。国家不仅缩小了，而且还“软化”了，这一事实为民间部门的积极性和进取心敞开了新的大门，也给自愿缔结私人合同带来契机，这些往往发生在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发生在通常被称为“第二经济”的领域。这些效果总是没能摆脱某些副作用，譬如削弱对法律的尊重，对作弊和腐败持放纵、容忍的态度。我们将通过具体的研究，努力阐明哪些是正式发生的变化，哪些是由于“软化”国家控制引起的非正式变化，尽管我们并不能明确区分所有情况。

#### 4.1 产权和创业精神

在一个最大状态的国家里，几乎所有打工赚钱的人都必须受雇于政府。除少数特例外，通往上层社会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在官僚层级制内谋求发展。

在匈牙利，合作社已经形成，主要集中于农业和城市服务领域，但它们并非产生于真正的自愿合作运动。它们的运作与国有同行几无差别：经理始终由事实上的官方任命，并且必须遵从指令性计划。此外，民间匠人的数量已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其中只有少数人曾经雇用劳动力，通常最多有一名雇员。改革之前确实出现过影子经济活动，但只是偶尔发生，因为追逐这种活动是相当危险的。

在我们看来最明显也最重要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私营部门发生了演变。

---

<sup>①</sup> 相关资料是可以查到的，但它们只描述琐碎的情节，而对我们这里要处理的现象来说，其描述性指标是无法由简单的求和过程来测算的。

<sup>②</sup>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本人 1986 年的论文里查阅有关匈牙利改革进程的更详尽综述，该文为那些寻求更多细节、更多量化数据的人提供了一些统计数据和大量参考文献。

这个部门的运作形式多种多样，我们只谈论其中最重要的：

(1) 小型家庭企业：包括匠人、商人、汽车维修店业主，等等。现在，这些人由国家权威机构发放执照，可以雇用一定数量的员工。

(2) 小型家庭农业：在这个部门里我们发现，家庭的部分工作时间用于经营私人农场，同时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往往在某个农业合作社、某个国营农场或者其他经济领域工作。

(3) 私人“业务工作合营公司”：他们必须获得正式授权，而且经营的可能是中小型企业。成员都是结成合作伙伴关系的业主，并为此共同付出自己的劳动。

(4)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兼职工人或服务于较大公司的工人，但他们是在家里工作的；这类工作在“第二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估计正规和非正规私营部门的总规模并不现实，因为照定义看，它们大部分都未被记录下来。根据粗略的猜测，这个部门占全国总产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至少四分之三的匈牙利家庭为第二经济做出一定贡献。另外，这一部门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实际的生产，而是像我们之前探讨方法论时所提到的，大量存在的私营部门提供了各种机会。改革之前，雇主说到底只有一个：国家，因此不存在任何有意义的经济手段可替代在国有部门的工作。如今，即便绝大多数个人仍受雇于国家，他们也有更多的自由考虑是否选择退出。如果愿意，他们可以开办私人企业或者尝试自谋职业，甚至成为私企雇员。也就是说，尽管国有部门仍旧占据大半边天，但其就业垄断已被打破。所以，个人变得越来越独立，虽然受到诸多限制，但他还是能够自己当家作主。这种感知的养成，标志着一场极具历史意义的变化。

对于那些精力充沛、天资聪颖的人来说，现在出现了两种而不只是一种发展途径。以前，他们可能总想着要在官场仕途大展身手，可眼下另一扇门开启了：他们可以选择成为企业家。许多人更偏爱第二个选项，因为他们喜欢掌管自己的事务，享受独立自主的感觉以及在市场上冒险的际遇。<sup>①</sup>而且，只要他们能干外加一点点运气，往往能比身居政府最高职位的人挣得更多。这种人格特质几乎被完全压制了几十年后，当你看到真正的企业家再次出现时，会感到

---

<sup>①</sup> 有关这两种类型的向上流动和匈牙利乡村企业家精神的讨论，参见 P. Juhász (1982)、I. Sreltnyi 和 R. Manchin (1986)。另可参见 I. R. Gábor 和 T. D. Horváth (1987)。

非常兴奋。正是这群人，本着真正的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引进新事物、创造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建立新组织。

但是，私人活动仍然牢牢受制于一系列的官僚约束：行政许可，反复变化的税制，获得土地、建筑物、材料、信贷和外币的障碍，等等。可雇用的人数也有上限：长期工作的员工数量包括家庭成员在内不得超过9人（在商业领域不能超过12人）。这一限制倒是可以规避，例如雇用更多的临时工代替永久劳动力，可是民间商人非常清楚，那么一来他们根本没办法成为“大资本家”。此外，最重要的束缚或许是：小型民营企业在一种不确定、不安全的氛围中运作，没有足够的产权保证，不能防范不可预知的官僚干预。

这里稍微插一个题外话，我们且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sup>①</sup> 确保国家实施的所有限制并非出于结果主义的考虑是很重要的；例如，不要一心想着分配格局或对不平等的容忍度。真正的是，允许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允许某一特定“程序”，即民间商人和大量雇员之间产生一定收入权益的资本主义关系。富裕的私企商人如果愿意，可以把他的收入花在奢侈品上。但他不得建立大型民营企业，即使这个企业家和大量潜在员工乐意自愿缔结劳动合同。我们认为，这严重削弱了个人的选择自由，以便防止程序和体制朝着某种资本主义的形式演变。

综上所述，改革后的国家处在一种好奇与不协调相混合的传统“守夜人”状态，即国家保护公共和私人财产的安全，依靠某种“创新组织”限制产权，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限制挪用私人财产。

#### 4.2 职业、工作和工作时间的选择

上一节里对国有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讨论已部分涉及这些问题，但仍有若干事项值得更深入的探讨。本节的研究将以表格形式呈现（第4.3节和第4.4节也将如此）。

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经济体的各个环节，始终没有出现过完全相同的情况。为了进行更清晰的对比，我们挑选出最极端的情况（它们绝不是无足轻重的特例，相反，至少都在某个主要部门盛行了一段时间）。在随后的表格里

---

<sup>①</sup> 参见 R. Nozick (1974, 尤其是第7章和第8章), A. Sen (1981), 以及 A. Sen 和 B. Williams (1982)。

我们仍将使用这里选择的极端情况。

表1仅讨论国有部门的问题。该表本身的描述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只解释第4行的内容。在这里，我们必须牢记第4.1节提供的关于私营部门的信息，并结合表1所述的国有部门的信息。在最大状态，与选择更多工作（为了赚更多钱）还是更多闲暇的经典问题相关的个人选择受到严格限制。工作（这里指一份稳定的工作）由法律规定，只有健康、生育等原因才允许特殊例外。不遵守规则的人会被打上“寄生虫”的标记而遭起诉。员工可能被迫加班，但如果老板不要求加班，员工就找不到（实际上是不允许找）其他方法赚更多的钱。在改革后的状态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允许个人不必拥有固定工作。虽然强制人们工作的旧法仍然有效，但不再是贯彻实施的原则，而且违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另一方面，个人可以选择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法定的最低限度40小时，往往还能兼第二份甚至第三份工作。人们可以打各种零工，一边为第一经济产业工作一边搞活第二经济。有人估计，至少半数成年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不包括家庭的工作），此外还有比例较小的部分人口每周工作80—100小时。其结果是，许多匈牙利人劳累过度。但是，就工作和休闲之间的选择而言，个人自由已经扩大了不少。<sup>①</sup>

### 4.3 消费者选择<sup>②</sup>

表2概括了这方面的变化，但仅涉及最具代表性的部门，因此并不全面。该表也只给出了几点评论。

请看第3行和第5行的内容：根据社会主义改革的指导理念，住房和医疗保健是国家必须满足的基本需求。每个公民都有权获得，因此，住房租金远低于市场出清的水平，医疗保健是免费的。但个人不能影响这些部门使用的资源数量，因为官方全权决定它们的配给。事实上，这些基本需求并不受特别关照：相反，

---

<sup>①</sup> 1986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向个人受访者询问了如下问题：“当你的实际收入下降时你会怎么做？”42%的受访者回答“削减开支”，而41%的人则回答“延长工作时间，赚更多的钱”。这些资料以及本文后面所提资料的数据来源出自K. I. Farkas和J. Pataki（1987）编写的一份备忘录，总结了布达佩斯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一些调查结果。在此感谢他们的有用帮助和研究中心的支持。

<sup>②</sup>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考察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消费者选择与生产响应之间的传导机制。为此，深入探索价格和税收制度的运作、企业的激励机制等问题是必需的。这些可以单独作为论文主题加以研究。

得到优先考虑的是其他行业，大多是计划者认为对经济增长有直接影响的部门。住房和健康问题频频无人过问，以致在国家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远低于国家市场经济的相应比例。资源配置的集中化抑制了消费者的优先考虑权。

改革提高了消费者选择的影响力，进而带来了有益变化，但是这些成果实在来之不易。被忽视了几十年之后，住房供应的负担大部分转嫁给了各个家庭。需要住房的公民深陷困境。没有足够的信用，也就没有发达的中小型建筑商系统以备快速、可靠地兴建私人住宅。由于短缺和价格高企，许多家庭被迫“自己动手”造屋结舍，依靠的是家人、朋友和第二经济的帮助，在时间和金钱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些家庭根本无法应对这种繁琐的过程，既被供应不足的公共住房拒之门外，又无法承担私人房屋的高成本，处境每况愈下。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感觉情况有所好转，因为至少他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如何解决住房需求问题。

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官僚配给与隐晦的商业化相结合多少有些违反常理。所有公民享受免费医疗这一事实并不令患者感到欣慰，因为医疗服务质量常常不尽如人意。此外，医生和医务人员当中也存在诸多不满情绪。公众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迫使计划者不得不给卫生部门配置更多的资源。漫天发放的“小费”是一种奇特的信号，表明为了健康很多人愿意自己多掏腰包，以期得到更好的治疗和照顾。然而，至今尚未发现某种适当的体制和经济框架能够满足市民的医疗保健需求。

请注意表1的第5行和表2的第7行，即有关出国旅游和工作的权利。匈牙利个人到非社会主义国家旅游的数量正逐年增加，从1958年的22 000人增至1985年的655 000人<sup>①</sup>（当年总人口为1 060万）。前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游客数量更是翻了好几倍。尽管还有某些限制，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被严密隔绝了数十年后，大部分匈牙利人如今终于得享探索世界的自由。

---

<sup>①</sup> 资料来源：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1966，1986b）。

表1 职业、工作和工作时间的选择

	最大状态: 50年代初	改革后状态: 80年代中期
选择问题	国家控制状态 (集权的巅峰时期)	个人自由 (分权的巅峰时期)
(1) 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选择	官僚机构对选择申请在哪里入学有很强大的影响力。申请人数大大超出教育机构的接收能力。严格的选择对象、优先次序取决于政治标准。教育需求和人力资源的组合出现分歧差异时, 高等教育申请者都根据生产需求重新定向	中等教育以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超额需求仍然存在。许多申请人未被录取。官方为某些专业指定职业培训并不罕见。教育培训组合并不按需调整。
(2)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选择	强制分配	不存在
(3) 工作变动的选择	禁止未经上级同意擅自转换工作。“任意”辞职将受到严厉处罚。如果认为有必要, 上级有权进行强制调任。在安排工作调任过程中强制实施“劳务交换”	对于那些职位数量很小的职业, 官方有权对转换行业施加压力
(4) 工作时间的延长	如果企业有需要, 官方将施压要求员工加班。否则, 通常禁止加班	官方对“常规”加班限制较少, 对 VGMK 的活动则严加限制



		最大状态：50年代初		改革后状态：80年代中期	
选择问题	国家控制状态（集权的巅峰时期）	剩余的个人选择范围	个人自由（分权的巅峰时期）	剩余的官僚约束	
(5) 出国就业	不允许	没有	有可能	需要匈牙利当局授予工作许可证。外汇收入按规定比例强制汇回国内	
<b>表2 消费者选择：商品和服务</b>					
		最大状态：50年代初		改革后状态：80年代中期	
选择问题	国家控制状态（集权的巅峰时期）	剩余的个人选择范围	个人自由（分权的巅峰时期）	剩余的官僚约束	
(1) 食品	特定时期实施基本的食品配给（发放配给券）。短缺现象长期且严重；所有类型的商品几乎完全匮乏。一些食品直接分配给国有企业的工人。特权集团获得更好的特殊供给	货币购买受左边所列条件限制。存在零星的黑市	供给大大改善。废除了所有的官方配给。取消特权供给，个别特例除外	短缺现象仍然存在，但不再那么严重；某些领域出现局部短缺，供货延迟，一些地方配给不足等。特殊货品可以用可兑换货币购买	
(2) 其他消费品	没有配给券。短缺现象长期且密集严重。有特殊供给〔与(1)中相同〕	同(1)	供应大为改善	同(1)	

续表

	最大状态：50年代初	改革后状态：80年代中期
选择问题	<p>国家控制状态（集权的巅峰时期）</p> <p>城市住房：公寓住房国有化。国有公寓由政府当局分配。由于严重短缺须长年等待。频繁被迫和搬迁。转租、分租受到严格限制。很小一部分房屋或共管公寓可以为私人占有</p>	<p>个人自由（分权的巅峰时期）</p> <p>城市和农村住房：私人住房飞速增长；大多数新建楼房为私人所有。小部分国有住房私有化。国有住房租赁交易属非法行为，但被默许。转租现象普遍，为城市和度假地的个人提供了可观的租金收入</p>
(3) 住房	<p>剩余的 个人 选择 范围</p> <p>城市住房：有些许机会可以买进或卖出私人家庭住房或共管公寓。允许租户之间自愿交换租用国有公寓，但须地官方许可。某些区域流行转租、分租。农村住房：大部分为私人所有；住房可以出售和购买，但受到行政管理限制</p>	<p>剩余的官僚约束</p> <p>城市住房：大部分城市住房仍属国有；短缺现象严重，等待住房供应的时间漫长，供应与需求之间难以调节</p> <p>城市和农村住房：房屋所有权有严格限制，或严格限制；个人可拥有什么样的住房以及拥有多少住房</p> <p>对抵押贷款、紧缩的信贷配给有超额需求。私人楼房经常出现建材短缺和建筑容量不足的现象</p>
(4) 交通和通讯	<p>所有的运输服务由国有企业提供。只有少数特权集团能拥有私家车。电话线由行政分配到家庭。等待安装电话的时间极其漫长。</p>	<p>私人汽车的数量迅速增长，出现二手车自由市场。如果个人购买了电话债券 (telephone bond)，允许他插队申请牵拉电话线</p> <p>垄断国有企业出售的新私人汽车长期出现超额需求，等待批准的时间漫长。拥有特权的个人可以插队。等待安装电话的人增多，继续实行行政配置</p>

	最大状态：50年代初		改革后状态：80年代中期	
选择问题	国家控制状态（集权的巅峰时期）	剩余的个人选择范围	个人自由（分权的巅峰时期）	剩余的官僚约束
(5) 医疗服务	<p>国家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国民享受免费医疗。没有选择的自由——强制分配医生和治疗场所（医院，等等）。医疗服务需求严重超额，医院、手术室过度拥挤，等待治疗的时间漫长。除少数例外之外，禁止医生私人开业。特权人物有专门医院</p>	<p>在某些情况下，个人有机会要求更换分配给他的医生以及选择治疗场所。通常禁止私人行医，但允许有部分例外</p>	<p>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行奇怪的“双重配给”制。名义上还是免费医疗，但很多患者会给医生红包（“小费”）以期得到更好的治疗，这种行为为违法但得到默许，并对选择医生和治疗场所产生强大的影响。私人诊所大增</p>	<p>依然实施正式的强制分配医生和治疗场所的规范。自由选择不方便，也很危险且不方便。医疗服务仍然供不应求，甚至更加严重。特权人物继续配有专门医院</p>
(6) 儿童保育	<p>由于低工资和社会压力，女性工作的比例增加。儿童保育机构：公立日间托儿所和幼儿园。儿童保育机构需求超额，且实行的是行政配置</p>	<p>无行政措施制止母亲亲留在家里照看孩子</p>	<p>产假延长，并获得适度的财政补助。在家照顾孩子的母亲比例上升，可以兼职或在家工作也起到激励作用。出现一些私人儿童保育服务：私立幼儿园、保姆等。</p>	<p>公立日间托儿所和幼儿园仍然供不应求，同时继续实行行政配置</p>

续表

	最大状态：50年代初	改革后状态：80年代中期
选择问题	国家控制状态（集权的巅峰时期）	个人自由（分权的巅峰时期）
(7) 娱乐活动和出国旅游	<p>公共假期住宿场所由工会官员指定。出国探亲、旅游非常罕见，只有特权阶层才能享受。通常是组织成团队，且不带家属。到西方国家旅游的机会几近于零</p>	<p>许多家庭拥有自己的度假别墅或小屋。出现商业度假设施（旅馆、露营地、私人住宅客房）。单独或与家人一起出国的人数量剧增，可以去东、西方国家，可以是探亲或旅游</p>
	<p>剩余的 个人选择 范围</p>	<p>剩余的官僚约束</p>
		<p>许多公共假期住宿（工会、公司招待所）仍然存在，但已经存在若干其他选择。出国旅游需要有行政意见，包括征得主同意（除了前往某些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私人旅游次数受限（见第4.4节的“购买硬通货”）</p>

#### 4.4 居民储蓄和投资

在改革前的制度下，从收入中花多少钱、存多少钱由居民自行决定，并受到一定的限制。

国家几乎每年都会发行低收益的政府“债券”，并通过各种激进的政治运动强迫公民购买。现在这种做法已被废除（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其他更“商业化的”债券问题）。

当所要求的消费品和服务供应不足，因而居民收入中用于花销的部分支出不能使用时，就出现了非自愿储蓄。鉴于非自愿储蓄很难测量，关于短缺诱致型储蓄的程度，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消费者宏观市场的学者们众说纷纭。无论怎样，只要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明确意味着个人自由受到了限制。改革之后，就算第一经济没有动静，第二经济中也已经扩张出大量的消费机会。因此，即使短缺幼稚型储蓄确实曾经存在，肯定也不再是普遍现象。

一旦决定了储蓄，就会产生应该采取何种储蓄形式的问题。改革前，可供考虑的选项少之又少。大部分积蓄都以现金或银行储蓄账户的形式保存，而且通常产生很低的名义利率（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利率为零或负值）。只有相当有限的保值实物资产可供使用。上文已经提到，房地产的购买受到严格限制。持有贵重金属要遵从行政约束，另外，艺术品贸易市场也还不成气候。后来，改革拓宽了选择范围。银行提供种类更加繁多的储蓄账户，虽然实际利率仍然很低甚至会出现负值。公民可以购买各式各样的人寿保险、养老保险、“按收入存款”保险，以补充国家提供的保险和养老金。公司、合作社和地方政府如今发行的债券不仅回报可观，还有国家作后盾，越来越受广大市民欢迎。购买房地产的条件虽然仍旧相当苛刻，但是机会已经增多，其他保值资产市场也逐渐得到发展。

尽管这些成就有目共睹，可严格的限制依然存在。

私营企业急需外部融资，国有银行部门却捂紧钱囊，吝于提供信贷。很多人都乐意借钱给私营企业。还有些人则打算投资私营企业，成为私营企业的匿名合伙人。<sup>①</sup> 这类民间金融和资本市场，当然需要有适当的机构、法律法规和一套用于执行法律

---

<sup>①</sup> 在一项多次被引用的1983年民意调查中，提出过下列问题：“假设你意外继承了10万匈牙利福林（约15年的平均工资）。你有两个选择：把它存进普通储蓄账户，或者靠它成为一家小型私人企业的合作伙伴。第二个选项有风险。你会选择哪一个？”48%的人选了第一个，47%的人选了第二个。资料来源：K. I. Farkas 和 J. Pataki（1987）。

合同的机制。但是所有这些非但不存在，相反还属于违法的安排。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已经成形，只不过改头换面成了个人贷款或友好行为（这些不违法），因此这些行为完全基于个人的信心，这使民间金融和资本市场风险很高，从而阻碍了它们自身的扩展。此时国家肯定是“最小状态”之上的国家，并未履行哪怕是一个最小状态国家本该履行的职责，即保护财产和强制执行私人合同。

在相关的讨论中，有人曾几次提议允许国有企业以某种方式发行普通股，使它们实际成为混合所有制下的公司，但建议一直未被采纳。

匈牙利货币不能自由兑换；匈牙利个人不能自由购买外币，尤其是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合法获得硬通货的渠道很窄（例如每三年可以申请一笔适度的旅游津贴）。另外，黑色和灰色的非法市场大行其道，但是它们的运作既不方便也很危险。由此带来的绝不是小问题。外币的可得是个人自由臻于完备的一个条件，因为它是发展各种人类文化对外交往所必需的。

这就是我们总结的匈牙利改革前后个人经济自由的概况。概而言之，我们的调查揭示了引言所述内容。改革进程大幅增加了个人的经济自由。然而，目前的状况并不令那些视自由为基本价值的人们满意。

## 5. 经济增长、福利与自由

个人自由与福利之间有什么联系？（篇幅所限，本文不对个人自由与其他基本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很显然，福利与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密切相关。

存在两种普遍的看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认为，经济增长和物质福利呈负相关关系，和自由同样是负相关关系。该思想体系不否认个人自由的内在道德价值，同时要求个人自由应服从于公共利益。一旦社会主义新秩序得以确立，公共利益就相当于生产和生产力获得稳步增长，从而促进消费增长。阻碍经济增长的个人自由必须让步给公共利益。

有不少论据主要是为了证明这当中存在某种替代关系。大家认为最重要的是必须提高投资率，因为那是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该观点指出，如果投资主要或完全依靠个人的自愿储蓄来融资，高投资率将无法得到保证。此外，根据消费需求调节供给的成本很高，需要频繁调整生产，增加商品种类，提高库存

水平，等等。因此，官僚集权加上长期短缺正好省去了这些调整成本。<sup>①</sup> 工作上的完全自由致使流动率过高，破坏了纪律也损害了生产的平稳性，并导致技能和已获经验的流失。相关的讨论不复一一累述。

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个人自由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强劲的正相关关系。自由选择、自由创业、利润动机和市场竞争都极其强烈地激励人们付出高效的努力。

遗憾的是，匈牙利的实践并未提供这方面的确凿证据。我们找不到支持“补充”论或“权衡”论的明显论据。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一直以来改革总是无法谐调一致，每每纠缠于个人自由问题。而官僚阶层过去执行的纪律已经放松，国家也渐渐变得“柔和”，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主要借助于极高的投资率和庞大的非自愿储蓄来实现强制增长的各种方法，如今不再可用。与此同时，严格的竞争准则尚未占得优势，所以，与自由选择相关的动机也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刺激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

至此，我们可以遵循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种思路从建设性改革者的角度出发，制定一个方案以消除改革的不一致性，并加强自由选择和效率之间的联系。这种做法无疑会颇富成效，但有可能得出另一种思路，该思路基于一个预测，即匈牙利的情况并非例外。几乎如出一辙的是，前后矛盾的“半落子”改革可能也会发生在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它们在开始推进权力下放和自由化的改革进程时，仍然保持着各自现行的政治结构。中国和波兰的最初经历印证了这一预测。

现在，让我们明确正视一个选择问题：如果必须在“最大限度”状态 and 半改革的“低于最大限度”状态这两种历史现实中选择，我们应该做出何种决定？<sup>②</sup>

让我们说得更具体些，考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该国的领导阶层没有推行南斯拉夫、匈牙利或中国式的改革。这个国家的体制框架没有进行过变

---

<sup>①</sup> 著名社会主义经济分析家怀尔斯肯定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他写过一篇题为“增长与选择”（P. Wilse, 1956）的论文。怀尔斯的主要思路是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抛弃了“多使用发刷少使用指甲刷”（或是相反）之类的个人选择权利，却能够坚持高投资率，从而获得了高增长速度，最终也提升了两种刷子的供应量。

<sup>②</sup> 这算是一个公平的比较。比较不同的乌托邦或不同的历史现实，是合理的做法。而现实中的斯大林主义和理想的“市场社会主义”乌托邦，则毫无可比性。

革，一直保存得完好如初，并能明智而有效地管理自身事务。要想证明自己发展得当，匈牙利的改革就必须经得起与东德相比较。为方便比较，表3列出了东德和匈牙利生产和消费增长率的传统数据。乍看之下，东德的数据更令人满意。

然而，在做出评价之前，需要说明几点。

首先，在测量经济增长时，人们可能对匈牙利的缺点抱有偏见。<sup>①</sup>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即东德与西德有特殊的渊源，这当然有助于东德惊人的经济成果。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类似的支撑，这个因素显然可以解释匈牙利和东德之间的部分差异。

表3 东德和匈牙利的年均增长率 (%)<sup>a</sup>

	东德	匈牙利
国民收入		
(1) 1956—1968年	7.4	5.7
(2) 1969—1986年	4.7	3.4
个人消费		
(3) 1954—1959年	7.3	3.9
(4) 1961—1974年	3.9	4.7
(5) 1974—1980年	4.0	2.7
(6) 1981—1983年	0.5	0.2

注：a“国民收入”是“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框架内的一个净输出概念，此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会计制度。“个人消费”包括家庭购买的所有消费品（住宅除外）、收到的诸如工资等实物或个人在自留地上自主生产的物品。用于比较的时间段略为随意，这是因为缺乏整个时期的可比数据。我们无法获得每一年的数据，而且，统计机构经常修改个人消费的定义，在先选择现行平减价格的基准年时，经常改来改去。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两个国家在表中所列时期的年均增长率计算结果还是可以比较的。从整体上看，似乎显而易见的是，东德过去30年的个人消费增长率平均来说一直比匈牙利快。

资料来源：第1行：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CSO) (1971)，第77页。第2行：CSO (1971)，第77页；CSO (1975)，第73页；CSO (1986a)，第64页；COS (1986b)，第374页。第3行：United Nations (UN) (1968)，第236, 293页。第4行：UN (1977)，第465, 579页。第5行：UN (1982)，第435页，UN (1983)，第576, 726页。第6行：CSO (1986a)，第306页。

<sup>①</sup> 匈牙利价格统计专家相信，匈牙利的物价指数比包括东德在内的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更准确，也更能反映通货膨胀的过程。这样一来只要我们对实际增长进行比较，就意味着对匈牙利的弊端带有偏见。



我们很难对东德和匈牙利之间的增长率差异做出精确的数值估算。为了提出更清晰的选择问题，我们假设：东德的生产和消费增长率均高于匈牙利。但另一方面，匈牙利的个人自由要比东德大得多。尽管人均消费率相当高，可东德的个人经济自由牢牢受制于各种短缺现象。<sup>①</sup> 虽然人们没有做过很深入的比较研究，但是观察家都会同意，匈牙利的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主要得益于非正式私营部门产生的额外供应，以及越来越丰富的进口消费品。至于官僚机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两国之间更是出现了明显有利于匈牙利的差异。比较两国的二维表现向量（包括第一维中的经济增长和物质福利的综合指标，和第二维中的个人经济自由的综合指标），哪个向量都无法左右对方。换句话说我们面临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一边是更大的个人自由外加生产增长放缓，一边是更大的物质福利外加受到限制的个人自由。

从引言中可以清楚地推断，在给定的社会政治和制度框架内，如果自由的拓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或某种替代关系，那么在一些限定条件下，我会选择增加自由权。也就是说，倘若只能在管控有方、纪律严明、强硬粗暴、高度集权的东德和更加自由、确切地说更无政府主义的匈牙利之间作选择，我会更钟情于匈牙利。

这个评价并不意味着全面认可匈牙利自改革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读者可以在我的其他研究论文里找到我对这方面的批判性分析。我在这里所作的陈述仅仅表示，尽管存在管理失当、重大变故、无数错误、政策前后矛盾又朝令夕改等弊端，匈牙利的发展道路还是比东德更接近于我提出的道德价值体系。

第二个限定条件是，上述选择并非基于辞典式排序，这种排序不过是将自由无条件地摆放在其他价值之上而已。我认为自由不是一道可以用“是或否”回答的简单问题。我不想牺牲各个方面的自由；但也接受对自由的某些方面施以某些限制，只要这种限制是显著改善物质福利的必要条件。但我不赞成因小失大，因为在我看来个人自由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当然了，这里没有什么先验

---

<sup>①</sup> 参见 Bryson (1984) 有关东德消费的讨论。Collier (1986) 对强制替代的效果进行了非常有趣的研究。他提出以下问题：“一个普通的东德家庭最愿意为‘资产阶级’权利支付多少，以获得按当前价格计算的‘名义需求’？这笔款项作为原始总支出的一部分，被定义为东德马克有效购买力和名义购买力之间的差距”（第 24 页）。根据仔细的计量分析，Collier 估计这一差值为 13%。由于实际数值取决于强制替代品的“成色”，更加细致的分析可能会导致差距更大。按本文的概念框架来表达，这一差值就是公民愿意为增加消费选择的个人自由而支付的额外费用。

的量化标准可以判断多少算“大”多少算“小”。不幸的是，道德难题只能根据具体情况逐一解决。

如果不想刻意模糊尖锐的道德问题，我们可以追问，至少就匈牙利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样的牺牲是否确有必要。可以肯定的是，匈牙利并不处在实现福利、正义、自由等根本目标的效率前沿。有许多措施或能深化改革，在提高效率和物质福利的同时无需进一步限制个人自由。事实上，通过取消竞争和创业的限制增加个人自由，就可能推动变革，从而提高效率和物质福利。

## 6. 公众舆论的价值

在评论改革的正面表现时，我已经明确表明了我的价值判断，但这没有多大意义。真正重要的是匈牙利全体国人的价值判断。

有一个广为接受的传统观点，即匈牙利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官僚阶层反对扩大个人自由，其他公民则要求扩大个人自由。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官僚阶层不是一个同质、僵化的社会群体。其中的许多成员摇摆不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想放弃自己的个人权力，可他们并不在意削弱其他人的权力。作为公民，他们享受新近获得的大量自由，如自由地选择子女的教育，生病时自己挑选医生，自由地旅游，更容易地获得消费品……此外值得谨记的是，政府机关的很多成员、某些身居要职者已经不再盲目信奉现行制度，而是更加乐于接受新的思想。

至于普通的匈牙利市民，他们仍是一个不那么同质的群体。汉吉斯(E. Hankiss)和他在匈牙利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开展了一项值得注意的调查，他们向大样本的个人询问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有一组问题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研究人员对类似样本提出的问题相同。受访者按要求对18个主要价值观进行排序，表4概述了我们认为相关的调查结果。美国人远比匈牙利人更重视自由。在美国人看来，自由紧随和平与家庭安全之后。匈牙利人同样认为和平与家庭安全分别排在第一位、第二位，但自由却排到了第八位。<sup>①</sup>只

---

<sup>①</sup> 从排序分布看，对于自由的评价，年轻一代比年老一代高，自雇人士或企业家比国家雇员高。

有 25% 的匈牙利人将自由排在前四位。

匈牙利人给自由赋予的价值相对较低，该如何解释这一惊人的偏好差异呢？

难道是匈牙利人已经习惯了别人必定会替他们做决定，而他们要做的只是服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有一个关于大检察官的比喻，那位官员解释说，人们害怕自由，并且希望遵从最高权力机构的指挥。<sup>①</sup>家长式统治给人一种安全和被保护的感觉。

表 4 匈牙利和美国的主要价值观排序

主要价值观	美国 (1968 年)	匈牙利 (1978 年)	匈牙利 (1982 年)
和平	3.30 (1)	2.54 (1)	3.88 (1)
家庭安全	3.81 (2)	4.09 (2)	5.30 (2)
自由	5.53 (3)	8.45 (9)	8.80 (8)
公平	8.51 (7)	9.53 (12)	9.07 (10)
救助	8.75 (8)	17.70 (18)	15.47 (18)

注：评估基于全国随机抽取的代表性样本。为方便起见，我们没有给出 18 个价值观的所有排序，只列出若干选定的例子。每一项的第一个数字表示整个样本给出的平均排序。第二个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在所有 18 个主要价值观中的排序，根据个人样本给出的平均排序算出。

资料来源：第一列来自 Rokeach (1979)，第二列来自 Hankiss 等 (1982)，第三列数据直接由 Hankis 及其合作者提供。

或者，可能是众所周知的“酸葡萄”心理作祟：一个人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自由，为了让自己安心，就根据自己的机会调整自己的愿望，从而使自由“贬值”。<sup>②</sup>

① Dostoyevsky (1880, 1958, 第 288—311 页)。

② 关于“酸葡萄”效应，参见 J. Elster (1982)。

或许，这是教育和大众媒体的偏见造成的？几十年来，自由的价值一直未被放在道德教育的显著位置。和以往一样，支持市场合法化、权力下放或其他改革措施的重要论据就是效率，即以更多、更密集的劳动换得更大物质福利的愿景。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自由，甚至在争论中提都没被提到。

表4并未显示在5年时间里自由价值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或许这种趋势自1982年那次调查之后已经发生改变，并将在未来有更进一步的变化。又或许用经济术语来说，真实的情况是，至少从长远看，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匈牙利国民获得的个人自由越多，他们就越习惯自由，一段时间之后，对自由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这项调查以一种较为抽象的方式提出问题：要求对一般的基本价值观进行假设性的排序。大多数匈牙利人可能会把具体明确的个人自由权摆在极高的位置，但没有意识到这些权力是更一般的基本利益（即个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解释间接得到另一项研究的支持；1987年，有人给一小批蓝领工人和学生做了一次民意调查。<sup>①</sup>这次没有要求排名抽象的道德价值观，只是提出一系列具体、明确的问题，以便了解各人愿意为获得更多的选择自由支付多少。结果表明，这一价值观受到相当高的重视。实际上，大约一半受访者愿意花更多钱获得下列自由权：（1）自由地给孩子选择小学，而不是由教育机构指定学校；（2）自由选择医生，而不是由医疗保健官僚机构分配；（3）能够在更多种类的电视节目中选择，而不是当前的两个频道。除了小学教育那个问题外，所得数据显示两组人的反应并无很大差别。学生明显更加注重这项选择自由，也许是因为他们切身体验了小学教育质量对以后的学习成绩的影响。

我们之前的观点，即匈牙利人高度重视定义明确的个人自由，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加以论证。显然，自由不存在供给过剩；任何新机会都会立即被开发出来，这表明一直隐藏着某种对自由选择权的需求。按照显示性偏好理论的模式，我们可以提出“显示性道德价值体系”。无论是理智的改革倡导者，还是务实的改革实施者，都不会过多谈论个人自由；但是，第4节所研究的制度体

---

<sup>①</sup> 资料来源：K. I. Farkas 和 J. Pataki（1987）。

系在特定方向上的变动，显示出道德价值观相对移向了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方向。<sup>①</sup>

## 7. 会迈向一个“中间状态”吗？

将来会怎样呢？近半个世纪前哈耶克<sup>②</sup>曾经指出，中央集权甚至稍稍削减个人自由都会将社会推上完全国家社会主义化的危险斜坡。虽然他没有说得那么直白，但是读者很容易得出最终结论：这是一条单行道。一旦社会到达某个集权临界点（哈耶克已经明确暗示其存在），就可能再也无可挽回。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分析，尽管后来的经验证明了其中的真知灼见，但至少“单行道”之说已经被驳斥。无政府状态和国家完全控制状态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最小状态和最大状态之间，显然是一条双行道，其中还可以观察到各种各样的变动：朝着某个特定点的方向缓慢前进，周期性的相互交替、来回运动，等等。“最大状态”（已经在改革国家得到清楚的证明）绝非不可逆或最后结局。

许多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学者（包括我在内）预期，在最大和最小状态之间的某处，可能会演变出国家控制和个人自由相交融的一种混合状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间状态”（medium state）。

这个观点不能与任何有关“最优”的概念联系起来。让我们从一些规范的想法入手。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讨论国家的作用时，往往提及三个功能：（1）政府实施的积极宏观政策，以实现经济稳定、充分就业、与外部世界保持平衡的经济关系。（2）政府有必要采取行动，抑制不利的外部性，确保适当的公共物品供给。（3）为了社会正义，扶贫济弱，需要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我们用术语“正当的中间状态”（justifiable medium state）来描述这样一种状态：政府活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至少提供这三个功能中的一个。作为公民，我赞同建立这样一个明确由上述价值体系构成的状态。我认为除了自由，福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产出、效率和生产率的增长）和社会正义也同样是基本的价值观。无论这些个人的价值判断如何，我都非常清楚这个规范

---

<sup>①</sup> 这个评论并不表示道德价值观的转变引发了制度变迁。本文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进行因果关系的解释分析，只是探究制度变迁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观。此方法并不讨论这些价值观是否真正产生动机的问题。

<sup>②</sup> F. Hayek (1944, 1976)。

意义上的“正当的中间状态”极具争议；实现上述三项功能也许会严重损害某个基本价值观。我希望自己慎重选择了正确的形容词：我讨论的是国家的“正当的”活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活动已被证明是明显合理的。这个形容词表达的是一个事实，即你可以提出支持这样一种状态的合理论据，而且这些论据无法立即遭到反驳。

无论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应期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程最后达到一种“正当的中间状态”，或是实现了任何体现上述三个合理功能的精心设计的蓝图。它不一定体现某个严格的规范理论，却是一种任意的、临时的中间状态，产生于即兴行为、短视的政治斗争、压迫和反压迫、创新和惯性，以及渴望扩展自由与诱使自由受限之间的妥协折中。一方面，这种状态可以不必非得通过政府活动来执行那三个合理职能。另一方面，这三个职能可以部分或完全不予履行，就像它们一直以来的样子。例如，国家可能并不十分积极追求一项合理的稳定政策（职能1），或保护自然环境（职能2），或通过社会政策帮助有需要的人（职能3），等等。

这样一种任意演变的中间状态能不能自我巩固？赞成和反对更多国家控制、赞成和反对更多个人自由的相互冲突的压力之间，能否出现一个平衡点？<sup>①</sup>

各种强大的力量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试图回归最大状态，剥夺个人在众多经济领域的选择自由。失去权力的官员想要夺回权力。此外，内部一致性也要求实施行政控制。当大量的（不是所有的）经济活动在官僚监管下开展时，漏洞便开始出现。很自然的，有人会大力动用更多的中央法规、法律和命令来堵住漏洞。最后，传统的思想道德也产生重要影响，因为它们似乎要让复归国家社会主义的趋势合法化，呼吁消除种种不良因素，包括无政府状态、自私的个人主义、投机倒把行为、基于财产而非工作得来的非劳动所得，以及少数幸运儿拥有的不道德富裕而社会上的其他人不能分享同等的福利。

但是，也出现了倾向于中间（或未及中间）状态的相反趋势。目前个人的合法权益与官方禁止或劝阻的行为之间的分界线并非一道“天然边界”。压力没有施加在一般性的“自由”上，而是施于个人自由向各个生活方面的特定扩展。

---

<sup>①</sup> 关于这个“改革平衡点”，参见 T. Baud (1987a, b)。

寻求提高个人经济自由的各种力量并不一致。它们由不同类别的群体组成，一般的政治哲学观和对好国家的设想都大相径庭。这些人当中，有思想解放、愿意放松严格管制的官员，也有能够洞察过时指令经济的局限性的开明规划者，他们愿意集中精力确定几个主要变量和关系，同时力求牢牢控制这些指标。许多改革家热衷于打造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福利国家，他们希望这种国家会比现在更加公正、平等。还有一些人想超越中间状态，离最小状态更接近些，不过当看到出现从最大状态向更多个人自由的移动时，就算这种移动很小，他们也会非常高兴。

这里，有必要插一段简短的题外话。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东欧改革家是变相的“撒切尔夫人的支持者”。要解释这么一个大误解，让我们再次运用和图1一样的图解。图2有三个箭头。A代表西方保守派，B和C分别代表两组不同的东方改革者。他们的共同点是，所有的箭头全部向下，换句话说，他们都希望回到活跃的状态并增加个人自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使用的论据和辞令会有那么多相同之处。然而，这三组人之间存在极其重要的差异。A组认为属于国家活动太多、自由太少的情况，东方的主流改革派则认为是理想的的活动水平和可接受的个人自由程度。我们发现，A组和C组之间存在更深层的思想和道德上的紧密关联，即一些西方保守派和一些东方“极端自由派”乃至C组的成员当中，可能对废除最大和/或中间状态创建的所有制度抱有强烈的保留意见。

B组和C组之间的分歧被粗略地简化了。即使在以前，各流派的改革者之间更加适当的分类也有点过于简单。更确切地说，改革派的阵营包含了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意见、承诺、潜在方案和视角。一旦稳定地到达某个中间状态，这个联盟极可能瓦解。接着，一些群体想在某些方面重新向上移动，另一些群体则希望在其他方面向下移动。在调整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时，如何精确划分界线的争论会变得相当尖锐。将联盟凝聚在一起的纽带，恰恰是引发趋势逆转的严重威胁；另外还要担心情势可能急转直下。最终，这种凝聚力可能会促成一种稳定的“中间”状态，对立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意识形态和道德价值体系在此达到微妙的平衡。

我们无法可靠地预测这种“中间状态均衡”的演变过程及其持续时间。它只是发展过程会采取的途径之一。生活的许多方面完全或部分回归最大状态，并非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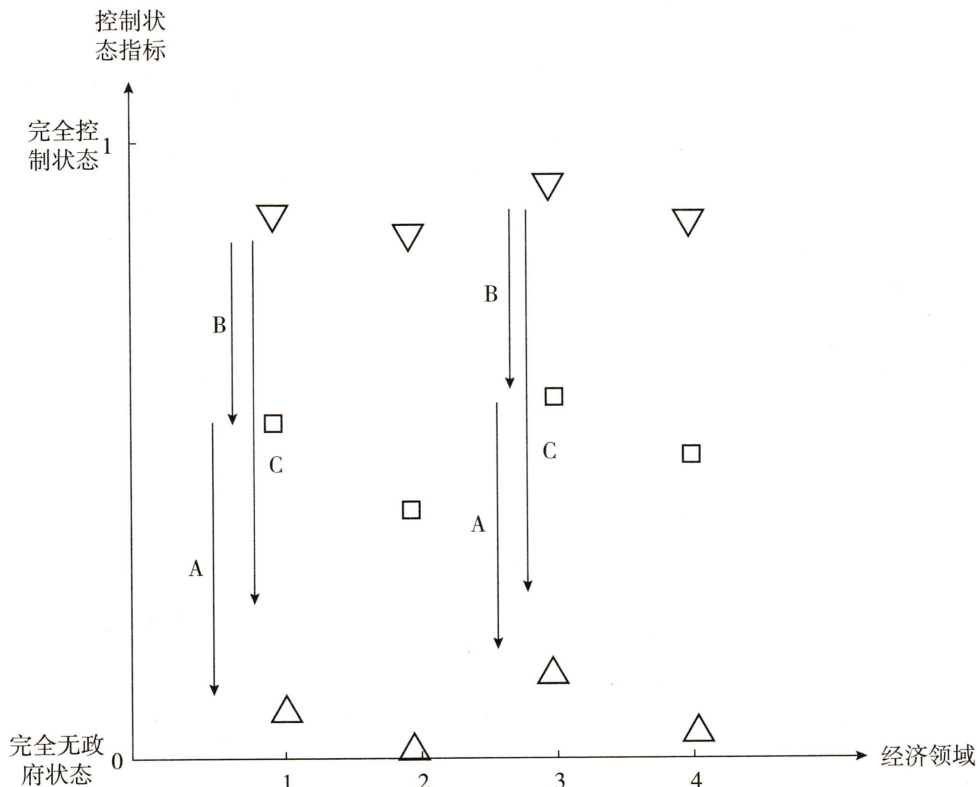


图2 西方保守派和东方改革家期望的变化

图标：▽最大状态，□适中状态，△最小状态。A：西方保守派期望的移动，B：东方“主流”改革派期望的移动，C：东方极端自由改革派期望的移动。

正如历史上一直发生的那样，所有这些趋势的结果取决于各个群体实际的相对优势，以及许多其他不可预知的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所有那些积极参与各类事件的人们如今面临着异乎寻常的思想和道德挑战，势必要为子孙后代担当起巨大的责任。

(颜超凡 译)

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略，特向作者和读者致歉。需要者可向《比较》编辑室索取：bijiao@citicpub.com。